

# 世博会曾震荡晚清王朝

1910年,辛亥革命在即,清政府风雨飘摇。这当口,出版商人张元济从国外寄回了几封信,发表在报纸上。这些信的作者是一名曾参与百日维新的前翰林,刚拜访了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博会。

张元济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去西方旅行可以得到救国的启示。但7次踏进世博会会场后,他首先感到了羞愧。他的国家,人口世界第一,却只在不显眼之处有个小展馆,规模不但无法与法、德等大国相比,甚至还比不上袖珍小国摩洛哥。他那地大物博的祖国,展馆里商品匮乏,数来数去,只有漆器、刺绣等老花样,尚不如苏杭一家杂货店里种类繁多。最让张元济感到羞愧的,也许是外国游客的反应:展场冷冷清清,西方人绝少光顾,驻足,即便偶然经过,也是“指指点点、摇头蹙额,旋即转身离去”。

寄自海外的这些信件,深深刺痛了许多国人。一场世博会让人看得很清楚:这个天朝上国,在世界上已经如此羸弱!

若干史料表明,1851年英国兴办世博会,是为了开拓市场、展示国威。忙于修建水晶宫的英国人未必料到,他们给远在东方的中国,带来一个打量世界的契机。

已很难想象,1876年李圭初次进入世博会是何心情。在位于美国费城的会场里,这个中国海关关员面对叫不上名字的机械和发明,在书里记下惊讶和感慨。作为第一个代表官方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里,详细描绘了蒸汽机和打字机,并忍不住在描绘的末尾加上“是可异也”的感叹。此外,他还在书里对西方“政治之善”进行探讨,介绍当地妇女地位的平等,并对国内鄙夷现代机器的心态进行反驳,强调“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不应废而不用。

在世博会上,李圭还看到了中国幼童在美国学习的英文作业。这些幼童于1872年由“留洋事务局”选派,并资助前往美国留学。费城世

博会期间,117名中国幼童在中国官员和美国教师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参观,并成为当时费城的重头新闻。

李圭在会上问了幼童们几个问题,对于世博会的益处,有的幼童称“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这些回答“简捷有理”,让李圭盛赞西方教育的优越。

不过,让李圭欣喜的事物,在国内则引起许多惊恐。守旧者攻击称,幼童们传统文化基础薄弱,恐怕西学未精,而传统已先丢掉,即使学成回国,也“无益于国家社稷”。而奉命在美国监督幼童的官员,甚至因为幼童跟自己对话时目光直视,而感到不满。

在种种非议声中,1881年,清政府裁撤了“留洋事务局”,将幼童全部撤回国内。这次培养人才的努力草草夭折。

留洋美国的经历,到底给这些中国少年留下什么,已无从考证。但回国后,他们有的成了清华学院最早的校长,有的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也有的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理……

而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则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股世博会热潮。据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回忆,他曾深受这本书的鼓舞。

尽管每次都收到邀请,中国政府直到1873年才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奉命组织此次参展。他积极征集民间商人参加展览,并利用自己的关系,与西方国家进行沟通。

中国的展品尽管只集中于茶叶、丝绸等特色展品,但参观者对此交口称赞,奥地利皇帝因为中国代表团的贡献,特地为每一个参展者颁发了勋章。

中国第一次像一个大国一样受到尊重,这也许激发了清廷此后对世博会的兴趣。而作为此次世博会参展的功臣,赫德也从此牢牢把握着世博会代表团的组织者身份。在他的组织下,从1867年至1905年,中国先

后参加了29届世界博览会,这些参展经历,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赫德曾表示:博览会一个紧接着一个,“引起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现状的好奇。由于中国赴会展品很受青睐,中国人不愿参加世博会的观念逐步改变了”。

最早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就已经发现,在电灯、电话、先进机器等展品中,清帝国的展馆所能提供给世界的,永远都是绸缎、茶叶、瓷器等。在几届世博会期间,因为中国的展品中包括绣花鞋、刑具等物品,曾引起华侨和留学生的激烈愤慨,认为这样的展示扭曲了中国形象。

对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也许发生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中国展馆展出了一组人物雕像,有苦工、乞丐、娼妓、囚犯、鸦片鬼等,被认为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消息传回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自尊而敏感的中国人感到十分屈辱。

一方面是不断传来的西方文明资讯,另一方面则是本国落后的工业现状,这都深深刺激了有抱负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许多人开始主动前往国外参加世博会以开阔眼界,并著书立说,介绍新知。郑观应在当时风行的《盛世危言》中表示,举办世博会不但可以“兴商”,更能“立国”。而此时,工业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成为“救国”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发展经济、科技,进而带动教育和政治的进步。

此时,知识分子们希望的已经不只是先进的技术。有人注意到,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曾出现过孙中山的身影。这个赞叹“此为全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的人,正探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救国道路。

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近10年,内外交困之下的清朝政府开始酝酿最后一次变革。这些变化反映在它对该世博会的态度上。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清政府颁布了《出赛会通行简章》,开始对中国商人参加世博会进行规范。第二年,受命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被意大利的米兰世博会深深震撼,回国后立即上奏折建议学习。

这个帝国在它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放弃了对世博会、对西方文明的惊惧和排斥。

摘自《中国青年报》

# 8秒空难之谜

1981年2月7日,苏联海军四大舰队司令对各舰队司令部指挥能力的考试结束后,在返航飞机上,有太平洋舰队司令安德鲁特·斯比利德诺夫海军上将、舰队航空兵司令戈奥尔基·巴甫洛夫海军中中将等总计16名太平洋舰队的将领,滨海军区的一名陆军将军也搭机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有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军事主官和一些政府要员。

塔台在向太平洋舰队专机发出起飞指令后,飞行员仅仅滑行了不到几百米的距离,甚至没有滑行道跑道边缘就匆匆起飞了。飞行员机组都是太平洋舰队航空兵部队的优秀飞行员,他们驾驶类似机型已经超过10年。他们的起飞动作,采用了当时刚引入苏联的国际流行的平衡法,可使飞机迅速脱离地面,但这样做却使飞机离灾难更近一步:迅速爬升使飞机的升力迅速下降,而升力和飞机重量比值也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平衡性降到了极限。

刚刚升空的飞机仅仅飞行到50米高度时,就遇到了强大的侧翼气流。飞行员为克服这股气流,便习惯性地将飞机右侧气流的方向压了过去。没想到,极其不稳定的机身,遇到了强大的气流,飞机顿时像断了线的风筝向地面一头栽去,飞行

员和副驾驶惊慌之下都没有留下最后一言半语。但是黑匣子中却留下了导航员最后的声音,当时,惊慌失措的导航员喊道:“去哪?!去哪?!去哪?!”当然,他并不知道飞机此时正笔直地摔向地面。当时,飞机从起飞升空到最后坠地仅仅用了8秒钟。

飞机着陆后,几吨重的航空煤油涌进飞机客舱内,随后巨大的爆炸声击碎了一切幸存的可能……

不久,苏联当局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展开调查,从恐怖袭击到技术论证,各种可能性都在排查之列,没想到原因是这样。

原来,苏联时期所有物资都很匮乏,中心城市的供给要比边疆地区好得多,即将返回驻地的太平洋舰队军官们趁着演习间隙,疯狂采购边疆地区买不到的紧俏物资,有些军官甚至将在列宁格勒购买的彩色电视机(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彩色电视机刚刚投入生产)、捷克和波兰生产的组合式家具拼装板,全部带上了飞机。除了官员们随身携带的个人行李外,为了参加这次联合指挥演习,太平洋舰队代表团还携带了绘图仪、标尺和大量作战海图等保密物资。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沉,但因属于保密物资,全部由厚重的大铁箱封装。此外,太平洋舰队司

令还通过海军的关系在列宁格勒搞到了几吨重的优质印刷纸,也被送上了飞机。空难发生后,苏联当局组成的空难调查组曾对飞机残骸附近遗落的各种物品进行了称重,结果表明,这些物品的重量超过了图-104A理论设计的最大载重极限,飞机实际上已处于超载状态。

由于机上乘客都是太平洋舰队各主要部门的高级官员,因此作为同属太平洋舰队的专机飞行员,也没能对他们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和控制。飞机装载的大量货物都堆放在机舱尾部,而机舱前部则是舰队司令的专舱,这又为飞机埋下了祸根。飞机的重心偏向尾部,严重破坏了飞机的气动性能。虽然苏联军队内部有着严格的飞行制度,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难度很大。太平洋舰队的专机也同民用客机一样规定每名乘客只能携带20公斤行李,超载必须得到舰队司令的批准。但是飞行员安东·伊尤欣中校却没有严格按照这一规定执行,原因很简单,空难发生时他离退休还差两个月了,他只想着此生“平安”着陆了。

安东·伊尤欣没有站好最后一班岗,没有坚持飞行的原则,8秒的空难夺走的不仅是颐养天年的梦想,还夺去了他和飞机上同伴的性命,昔日鳌头独占的太平洋舰队从此辉煌不再。俗话说:笑到最后才最开心。我们有时往往因为最后一丝松懈让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摘自《读者俱乐部》

# 洋人大唐做大官

隋唐时期,对外交通发达。唐政府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任官、通婚。唐朝时做官的外国人多达三千,波斯人和伊朗人甚至官拜宰相。

最有名的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他十九岁来华,唐玄宗非常喜欢他,给他起汉名叫晁衡,在中国任官,官居秘书监监正。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馆长,从三品。

晁衡在中国三十多年,娶妻生子,他儿子可能二三十岁才知道父亲是日本人。晁衡觉得自己年事已

高,就向唐玄宗辞行,想回日本,唐玄宗不舍得,不让他走。结果那年中秋节,唐玄宗大宴文武,群臣赋诗,轮到晁衡的时候,作诗云:“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玄宗见他这么想家,只得放他回去了。

晁衡跟李白、王维都是哥们儿,他走的时候李白、王维都来送行,依依不舍。

王维赋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

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异域处,音信若为通。”结果一出海就遇到风暴,传回消息说晁大人遇难,李白都快哭死过去了,作诗云:“日本晁卿辞碧海,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消息传来没死,给刮到越南去了。

那会儿那船是帆船,风一刮,又没指南针,就只好跟着感觉走,登陆之后一看是越南。晁衡说明身份,安南都护一看,原来您是秘书监晁大人,赶紧护送到长安城外去了,结果绕一圈又回去了。晁衡后来终老于长安,客死在中国,终身没能回到日本国。好歹越南当时属安南都护所管,要是被刮到印尼去,那边可就不是中国地儿了。

摘自《特别文摘》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 你是谁

詹国枢

全国两会期间,温总理要在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媒体记者都早早赶来,抢占有利地形。起眼望去,人头攒动,已经坐得满满登登。

按大会要求,有些座位是要预留出来另有安排的。工作人员来到一位穿着人时的女士(中央电视台某著名节目主持人)面前说,对不起,请你起来,这个位子由大会统一安排。

什么?女士有些不悦,轻轻将头一扬,反问工作人员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我是某某某!  
某某某?工作人员摇摇头说,我不知道。请你起来!  
女士无奈,只好悻悻地站了起来。

以上一幕,十分经典,耐人寻味。再看一差不多的例子。那是多年前了,棋圣聂卫平应邀参加影视名流聚会,与张艺谋同坐一桌。张向聂依次介绍各位嘉宾,这是张三,这是李

四,这是谁谁谁。介绍到旁边巩俐时,张笑说,她,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她是谁?  
老聂瞪大双眼,一脸不解。  
全桌大笑。

这可算又一经典。大会堂工作人员不知道央视著名主持人,聂棋圣不晓得大明星巩俐,乍一看颇有些离奇,细一想再平常不过。知名度这个东西,说大非常大,说小也极小,它其实是有一定“时空”范围的。就说巩俐吧,其知名度之“时间”,只限于在张艺谋影片中担任主角那些年,而其“空间”,则仅限于演艺界和影迷圈。离开这一特定“时空”,巩俐的知名度,与街头百姓相同。

以上道理,说穿了非常简单,有的人却一辈子没闹明白。为什么某些人总爱有意无意高估自己呢?仔细分析,既和环境有关,也和人们对信息的片面筛选有关。凡多少有点地位有点知名度之人,无论走到哪里,总会听

到久仰久仰、幸会幸会之类的奉承。有的明星,外出时甚至不得不戴上墨镜,以免麻烦。久而久之,这些大大小小的名人或准名人就会产生一错觉,啊呀你看你看,俺知名度多么多么高呀,俺多么多么了不得呀。其实哪里嘛,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明白了任何知名度都有时空限制的道理,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就会冷静得多,低调得多,心态也会平和得多。远的姑且不说,只要稍稍回顾咱们经历的这个年代,各行各业,上上下下,从政治人物到演艺明星,从文学家书画家到歌唱家,曾经有过多少星光灿烂,又有过多多少少湮没沉寂!无论是谁,无论再厉害再有名的角色,都有高潮,也有低谷,有辉煌,也有淡出,都是既有走上坡路之时,而在达到巅峰之后,也终究要下下坡路直至退出历史舞台的。

一句话,在无情的时间老人面前,谁都不敢与之较量,谁都不是他的敌手。

所以,人们不得不感慨,大自然是那么永恒,那么博大,而我们自己,是多么渺小。

你是谁?  
匆匆一过客,沧海一粟耳!

摘自《金融报》

遍布荆棘;你把世界画成狗尾巴草的样子,世界就是狗尾巴草,卑微、琐碎,满目狼藉。

这世界是你的。你是随心所欲的恺撒。

静下来的时候,会发觉自己很轻。如同被人鄙薄的纸片,轻得没有了魂灵。案头的青花瓷,让我的灵魂顿生仰慕之情,到底是那些花的芳香溢了瓷,还是瓷的清辉润了花?那个永恒的秘密,任何人都无法破解。

这个夜里,只剩下幸福的呼吸,均匀、舒畅。仿佛快乐的孩子,为了催促自己早些睡下,一遍遍地数着那些枯燥的阿拉伯数字。

等到一切都停下来,一切都静下来的时候,人就老了,便会感悟很多别人无法理解的幸福,比如找个好朋友,找个好天气,找棵结满果子的树,插下几颗果子,然后坐下来,分享彼此无聊的生活点滴。比如默默地关注着一个你喜欢的个人,你从不对他说:来吧,看我的水,波光潋滟,是为你泛出的波瀾。你不愿打扰别人,你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只会对着山谷,喊出你的忧伤。你的安分守己的忧伤。

摘自《文苑》

# 半个自己

陈染

在某个单位或者某个社会群落中,一个人倘若不能够经常地迎合别人,别人就会转头还送给你一堵石头砌成的墙壁。渐渐,这样的“别人”多起来,你身边的墙壁自然而然就会四起,八方林立,你就会觉得生活的窗口处处向你关闭,方便与通融之门的把手被握在各种各样的“别人”手中,你寸步难行。你甚至开始怀疑你自己。

你还看到,很多时候,人群判定一匹马的价值,并不是依据它的矫健和力量,而是依据它的鞍具是否漂亮、贵重,判定一阵春风是否和煦,并不是用肌肤本身感受它的温馨和舒展,而是去用耳朵倾听风铃是否清脆和亮丽;作为精神食粮的一本书的分量,却被放在称量饼干几斤几两的天平上来计算;而一个丰富、复杂的活生生的个人,则更是……似乎一切都是依据事物本质之外的表象来衡量。

既然如此,聪明的马就不再忙着奔跑自己的腿脚,有悟性的风

首先考虑的是要在自己的颈项上佩戴许许多多铃铛……

这时,你发现你的双脚需要的不仅仅是鞋子,鞋子下边还需要有道路,这道路自然不能是那种拧着劲儿的绊人脚步的绳索,而是那种势如破竹、水一样通畅的“出路”。你需要出路,就如同音乐需要耳朵,绘画需要目光,如同氧气需要肺,佳肴需要胃。

慢慢你发现,人群实在“危险”,你必须舍弃一半本真的自己,把这张张面孔化装成毫无个人特征的众人皆同的模样,半边身体的骨骼也必须是圆滑的,以换取各种各样的“别人”在各种各样的路口的通行证。你必须学会与他人“处于危险的一致”。

能够生存下去,正是在于你无时无刻地脚踏这种危险而平庸的基石之上。这也正是克尔凯郭尔以抗拒和否定的态度所指出的“群众的时代”,“个人不能救助的时代”。

你其实只有半条命!因为,你若

是想保存整个生命的完整,你便会无生路可行,你就会失去全部生命。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始终在自己的身体里,为保存半条生命还是失去全部生命,进行着无声的选择。这一场看不见的较量从未离开过我。我无法彻底“这样”或者彻底“那样”。

最终的答案是无疑的:我只有半条命,我只能拥有半个自己,只要还想活下去的话。

我作为半个个人而存在着,她像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冷静而痛惜地看着被割舍、牺牲出去的另一半,如同看着另外一个人。她们就像合租在一套住宅里的漠然的邻居一般彼此无关,同时居住在我的体内。

属于我自己的这一半,尽管她更多的时间独处一室,显得冷落寂寞,但她忠于了自己,顺从着自己的精神,因而她是充满趣味的,内心充盈的;而被贡献出去的那一半,尽管她每日混迹在热热闹闹的单位体制里或者某个社会团体中,但他们不断地抛掷给她许许多多应接不暇的貌似真实的虚饰,而她必须给自己的思想和本意戴上面具,甚至是镣铐,像每天消化食物那样消化掉那些真实的虚饰,所以她依然是孤独的。

摘自《今晚报》

# 那些安分守己的忧伤

朱成玉

一幅安静的画,是画家揉碎了自己的灵魂,蘸着回忆,勾勒出来的梦。欣赏这样的画,也要揉碎自己的灵魂,走进去。

文字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倾诉方式,有时候觉得自己是那样一只咯血的火狐,在雪地上奔跑,追逐自己的梦,留下美丽的脚印。

夜深人静,一个人伏在书桌上,向一张白纸倾诉爱恨情仇的时候,我听到了时钟里秒针走动的声音,仿佛心跳,均匀而有力。心里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动,为这个寂静的夜里,它的陪伴。就想到了生命中的那些过往,那些值得你留恋的人和事,不也正如那不停走动的秒针吗?在生命中不停歇地跟随着你,陪伴着你。

躁动的人全去了街上,那里有烟火表演。我们常常这样贪婪,享受着在倾听天籁,仍然奢求眼睛能够享受美景。

现在我的身边只剩下旧事和静物,那些安分守己的忧伤,却带给我

幸福的闪电,令我浑身战栗。

安安静静的时候,在身边,一刻都不曾远离。比如,屋顶上栖息的鸽子,像一小堆一小堆的白雪,让人无比担心,它在某个炙热的午后,会悄悄融化;比如,邻家的小狗跑到我的院子里来,趴在我的脚边,为我看家护院;比如,在清晨,欣赏一幅安静的画;比如,在深夜,写上几句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涛声。静下来的时候,往事在心底慢慢融化。年少时光啊,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夜,一首首胡言乱语的诗。那时候喜欢点上蜡烛,其实蜡烛是我们每个人的光明。我们都是流泪的植物,都在生长,只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我们和蜡烛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奔跑,有着说不清的快乐,也有说不清的眼泪,那是成长的疼痛。

那时,整个世界都在眼前,可以尽情挥霍。你把世界画成仙人掌的样子,世界就是仙人掌,宽阔、敦厚,

# 我曾恨我的父亲

陈凯歌

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捻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

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春。

到了5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叫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10年。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刚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们妈,我的问题早已向

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是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時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验环绕着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拼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此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破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珠。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

摘自《我的青春回忆录》